



金勋：从朝鲜革命青年到中国红军参谋长

□ 王保彦

金勋，朝鲜人，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曾先后化名杨州平、杨宁、杨林、毕士梯。中学时期，他受家庭影响积极投身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成为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因在朝鲜反对日本侵略的革命运动中遭通缉，他流亡中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红23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等。1936年2月22日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8岁。

刻苦学习,训练成就过硬军事本领

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运动，1919年金勋来到延边，进入朝鲜反日团体举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获得初步的军事知识和本领后成为教员。次年秋，日本驻朝军队入侵延边清剿朝鲜反日团体，金勋带领军队奋勇作战，在青山里战役中获得胜利，击毙敌人联队长，鼓舞了士气。但是，部队在力量悬殊和内部领导问题影响下最终失败。看到日本侵略者毁灭村庄杀害无辜老百姓，金勋痛心不已，下决心学习军事知识和作战本领，以便在今后的战斗中打胜仗。1921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他化名杨州平以留俄华侨身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求学期间他求知若渴、刻苦训练，不仅理论课和技能课全校第一，而且每天坚持背着十块砖头跑十公里增强体能。同时，他关心中国革命的命运，热心帮助同学提高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引导大家心怀国家，立志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赶走侵略者。在他的帮助下，很多人改变了思想认识。

黄埔任教,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金勋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去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学生队第四队上尉队长等职。在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入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他带学生军一个连参

加了第一次东征，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6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实际由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金勋奉命调入独立团第三营任营长。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仅注重士兵的军事素质训练，还注重士兵的政治素质的培养，参加了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对于当地的农民，他关心他们的状况，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帮助他们反抗压迫。1926年4月中山舰事件之后，周恩来将金勋调回黄埔军校任教职，以加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始终立场坚定，支持学生进行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此后，金勋和妻子金锦珠一起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

东北组织抗日苏区,协助周恩来工作

1930年，金勋和妻子回到中国，应满洲省委的请求，他被任命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开始了在东北的革命工作。他积极主动协助省委书记罗登贤，一方面连续领导了“四三”“五一”“五七”反日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创建抗日武装。金勋与当时中共满洲省委驻吉林特派员张振国，中共北满特委兵运负责人杨君武先后来到磐石，帮助磐石县委以赤卫队为基础，创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他们与土豪劣绅和日本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东北影响非常大。杨靖宇到吉林后，将这支军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最后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2年7月，金勋奉命到上海参加临时中央军事会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情况。会后，周恩来将他召回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不久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兼任主任。此后一年多，金勋作为周恩来工作上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他协助周恩来组建了约2万人的10个补充团，进行训练后及时输送给红军主力部队，为部队的

壮大和力量补充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军用品，金勋和其他同志一起，带动和帮助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修建道路和桥梁。此后，他还担任红23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战斗中指挥有方，得到指战员的拥护。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总教官。他为了更好履职，化名毕士梯，尽心尽力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毛泽东曾专门就金勋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向满洲省委协调，但因中央苏区形势变化较快，他们没能再团聚。7月为表明抗日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我们党发出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组织并派遣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金勋衷心支持党的决定，拥护抗日。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揭露国民党卖国行径，反击国民党的谬论，提出抗日的正确代表是苏维埃及其红军，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

英勇善战,东征抗日,渡河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金勋被任命为干部团的参谋长，他在随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经常身先士卒，与敌人拼死相搏。在三渡赤水中，他参与指挥部分干部团负责中央领导渡河的警戒和掩护任务。在四渡赤水中，他为执行党中央强渡金沙江的任务，主动请缨带领侦察排去抢夺皎平渡口，在崎岖险峻的山间小路上展开，面对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的扫射，他毫不畏惧冲杀在最前面，激励战士勇往直前。最后干部团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

利，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他在长征中奋战的时候，他的妻子金锦珠（化名李秋岳）也在东北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抗日斗争。由于疏于照顾，他们唯一的孩子夭折了。1936年9月，金锦珠也在被俘后壮烈牺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年底，金勋多次参与指挥和参加重要战斗，比如，直罗镇战役中带领部队活捉敌人师长牛元峰。在党中央提出渡过黄河，东进山西抗日后，他积极为东渡做准备。为了保证主力部队和中央领导顺利渡河，身为师参谋长的金勋带领各团参谋长秘密化装到黄河岸边查看地形，运送船只。在进行军事动员时他表示，毛主席从这里渡河，我们一定要保证渡河成功！按照中央“深夜隐蔽偷渡，若被发现则立即强攻”的命令，2月20日他带着渡河突击队趁着夜色登船出发，但是木船在河中间被敌人发现，瞬间无数枪炮向他们袭来。他迅速命令强攻，进行反击并加速前行。在石楼县贺家凹咀头西北岸，船刚到浅滩，他立刻跳下水，指挥并带领战士与敌人背水一战，在进攻中前进，在前进中扩大阵地。占领贺家凹敌人碉堡后，乘胜向敌阵地纵深进攻，全部攻下河边山脚下的敌人碉堡。在继续追击敌人的过程中，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腹部，伤势严重。倒在地上鲜血直流的他不顾自己的伤痛，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昏迷期间，他多次自语：“毛主席过河了没有？”在得知毛泽东和大部队都过河了，才露出微笑。据周士第回忆，他去看望受伤的金勋时，金勋关心的仍是前方大部队进展情况如何。虽然全力抢救，但是因伤势过重，2月22日年仅38岁的金勋牺牲在了吕梁大地上。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在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中度过，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战士。



盛唐如何聚天下之才

□ 李栋梁

了留学资格，到了唐朝需要再度考试，考试合格可以留下，毕业还要统一考核，使留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和技能，掌握唐朝的文化。当时国外有志之士都把唐朝看作知识的圣地，新罗、百济、日本、高丽等国多次派遣留学生万里辗转，长途跋涉来唐求学。据《旧唐书》记载，在贞观时期，国子监六学学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唐朝本国学生为3260人，外国留学生接近5000人，占比为60%左右，这是唐朝最高的时期。

不拘一格遴选外国人入仕做官

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的科举制，选人不分士庶，不问贵贱，不分内外，以自由报名的形式打破了魏晋以来森严的门第界限，极大扩展了人才的选拔范围，致使很多外国人才实现了当朝为官的梦想，促成了能而优则仕的良好局面。对待外国人才方面，在一定时期更是开辟了绿色通道。贞观元年，唐朝尽力满足外国人登第入仕的要求，在科举考试中设有一门宾贡科。宾贡科异于一般科目，其特色为“各自别试，附于榜尾”，故命题、阅卷、

发榜均不与唐人一样，降低分数线录取。宾贡科及第的外国人一般被称为“宾贡进士”，允许其在唐朝入仕做官。

盛唐之时，外国人占整个官员编制的10%左右，来源涵盖了几乎所有唐朝的周边国度，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做官的外国人多达3000，甚至有的官拜宰相。

相互融合结出硕果

从盛朝璀璨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可以看出，唐朝内外技能人才在各自行业领域互相学习，相互融合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促成了唐朝的文学、绘画、舞蹈、音乐、手工艺等多种艺术领域百花齐放。唐朝历史上很多知名的文学家、诗人，多才多艺、妙笔生花，他们通过与胡乐人促膝交流、倾听胡人歌唱家的歌唱、观看胡人演奏家弹拨胡乐器，学习他们的音乐事迹、艺术人生，从而以此为素材，发挥写作功力，创作出胡汉交融的文学。西域的艺人们为大唐贡献了多种才艺。

当时于阗地区，胡乐人尉迟青善吹箏篥，尉迟章是吹笙的技能人才；同样出于该地区的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将少数民族画风带进

了中原地区。尉迟家族的两名画家热衷于人物画与花鸟画，所作的扇画在唐朝价值千金。

多渠道吸引留住众多国外人才

唐朝的人口政策不仅非常宽容，而且没有民族与国界的限制，当时长安甚至专门为西域人设置了“波斯邸”等机构，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赢得了“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的亲商美誉。在《唐律疏议》中明确，同国籍人相犯，依其本国法处置，不同国籍人之间相犯，以唐朝法处理，对留住外国人才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法治保障。尤其是唐朝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和文化传播，很多外国人被吸引到唐朝生活、工作、交流和学习。当时长安城中有着数不清的外国政治家、商贾、僧侣以及前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外国学生，唐长安城中的西市也成为当时外国人聚居与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场所。

在盛唐时期，全社会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为己所用蔚然成风，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对于来往大唐的大量外国人才始终保持着欢迎与接纳之心。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史华慈，多年来荣誉、著作等身，与史景迁、魏斐德被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开风气之先；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在当年即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被引入中国后更是一版再版，成为学术畅销书；之后的两部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也因为关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问题和海外华人问题而引发广泛关注。可以说，孔飞力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汉学家，他非凡成就的取得与其入乎其内的研究视角、见微知著的叙事风格、观照现实的人文情怀密不可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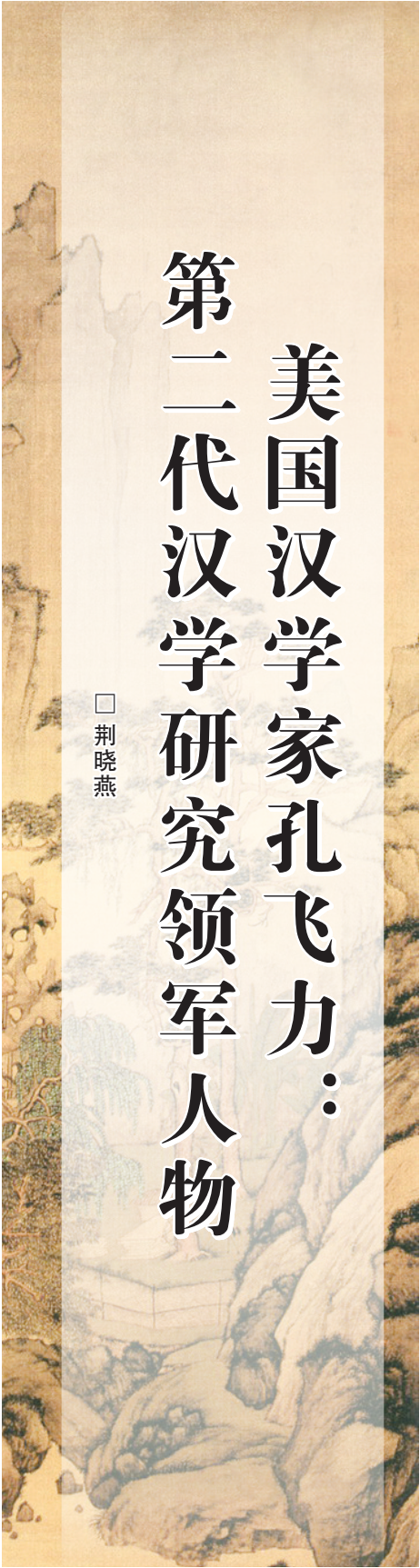
孔飞力的导师费正清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所秉持的基本研究框架是“冲击—反应”论。孔飞力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从清后期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问题入手，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晚清绅权扩大背景下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出“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这本书呈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更加注重内因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研究视角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疑具有超前的意义，为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孔飞力的研究是“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因此，孔飞力也被视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引领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内部取向”新趋势。

孔飞力这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念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可以说是以一贯之，这在他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更加明显的体现。该书探讨并揭示了旧帝国之下的社会 and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深层联系，认为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自我更新的传统。在寻找和界定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最初动因时，孔飞力拒绝把中国历史和政治放在一个屈从于西方模式的位置来进行讨论。他在该书明确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这种重视内因的研究视角无疑是更合理的，尤其是结合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更接近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唯我独尊，现代性应该有多种形式的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去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实现路径。

(二)

孔飞力的历史研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还要部分归因于他独特的叙事风格。他之所以被国人熟知，与其代表作《叫魂》密切相关。这是一部史料扎实、逻辑严密的学术著作，但其叙事风格和结构设计却让人印象深刻。该书是这样开篇的：“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这样的语句成功制造了一种悬疑感，给人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孔飞力很擅长“讲故事”，他把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写出了侦探小说的感觉。同样一件案件，孔飞力采取了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多元呈现，一个版本关注贩夫走卒、乡民村妇等普通百姓，反映他们对于妖术的恐惧；一个版本重在分析各级官僚在处理此次案件中所面临的种种掣肘和困境；还有一个版本分析乾隆皇帝如何通过这场恐慌来强化权力控制。三个版本相互重叠，像三棱镜折射出不同阶层的复杂心态。很多读者的鲜明感受是：“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

当然，《叫魂》的特别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叙事风格和结构设计，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孔飞力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看到了盛世背后的危机四伏，通过发生于1768年的这场恐慌作为个案来展现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深意，切口很小，但展现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孔飞力的这种治史风格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既注重宏观层面的综合，也注重微观层面的分解，以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等综合的视角来进行个案分析，进而展示宏大的主题。对于“大”和“小”的关系，孔飞力有过充满哲学意味的论述，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第二代汉学研究领军人物

□ 荆晓燕

(三)

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某种使命或价值的引导与支撑。关于促使他开展研究的内在动力，孔飞力曾总结道：“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可见，他的心中涌动着持久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因而笔端也时常流露出一种温情，这种温情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的观照。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在他看来，现在既是过去的未来，也是未来的过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不曾割裂的整体。因而即便是研究历史，也要着眼于当下，甚至应该为看清未来作更多的努力。

孔飞力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他对于历史大潮中普通大众的关注。他的史学研究，除了将着眼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之外，还包括将注意力从大处转向小处，将研究重心从上层转向下层。这种悲悯之心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有清晰的展现。谈到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动机时，孔飞力说：“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到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是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这段话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对于学术的探究，而是对人的关怀。浩荡的历史烟云固然令人激荡，而对于普罗大众的悲悯之情更令人动容。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二者得一，已属不易，孔飞力可以说二者兼得，他在扎实的史学功底之上，展现出卓越的史识和史才。他“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视角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独具特色的多元叙事风格引导更多学者去探索更有新意的表达方式，他对于现实的观照、对于大众的关怀让历史研究弥漫着人文情怀，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让孔飞力终成一代汉学家。